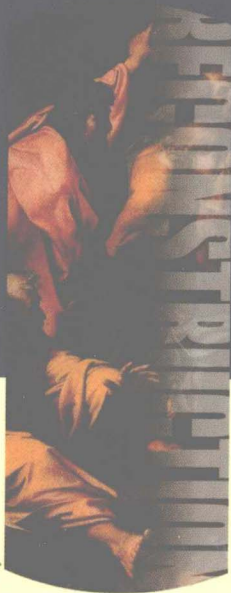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RECONSTRUCTION OF ENLIGHTENMENT RATION



重建启蒙理性

哈贝马斯现代性难题的伦理学
解决方案

杨淑静◎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RECONSTRUCTION OF ENLIGHTENMENT



RECONSTRUCTION OF ENLIGHTENMENT

重建启蒙理性

哈贝马斯现代性难题的伦理学
解决方案

杨淑静◎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建启蒙理性:哈贝马斯现代性难题的伦理学解决方案/
杨淑静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004-9382-2

I. ①重… II. ①杨… III. ①哈贝马斯, J. —伦理学—研究 IV. ①B516.59②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4963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当今世界的深刻变革，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从历史的大尺度看，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因此，“现代化”深切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深层地决定了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内在矛盾。现代化，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的自然人化过程，也就是以现代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过程，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急速实现的个体社会化过程，也就是以等价交换的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过程。由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便愈益明显地凸显了两个方面的尖锐矛盾：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的矛盾，二是人的生存方式的现代化与人的物化状态的矛盾。现代化所实现的空前的自然人化过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又造成了包括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以及核战争威胁等在内的“全球问题”。而市场经济所实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既挺立了个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增强了人的主体自我意识，形成了人的自我实现的某种条件，又造成了“抹去一切职业的灵光”，“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当中去”的生存状态，也就是使人“物化”的生存状态。马尔库塞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当代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性矛盾所构成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现实问题，也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理论问题。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以理论的方式关切现实，就必然把“现代性问题”

作为自己的重大的研究课题。

在对“现代性问题”的哲学思考中，当代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在其一系列的学术论著中提出许多引起广泛关注的重要思想。《重建启蒙理性——哈贝马斯现代性难题的伦理学解决方案》一书以启蒙为切入点对现代性问题进行研究，试图更深入地挖掘哈贝马斯现代性问题的内在逻辑理路及其解决方案，并给出自己对现代性问题的相应解释。作者提出：启蒙是现代性的本质、秘密和发源地，也是现代性问题中无法摆脱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启蒙的核心是理性，宗旨是理性的自由，而恰恰是理性的自由导致了理性的实证性和理性的至上性，从而使启蒙理性走向了片面性——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奉行的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把人上升为主体，而世界则沦为客体，在主体对世界的绝对统治中，理性自身丧失了本应有的批判功能，理性自身蜕变了。蜕变后的理性侵蚀了生活世界，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就是根源于启蒙理性的现代性难题。现代性问题与启蒙理性相互纠缠在一起，要拯救现代性就要对启蒙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本书作者认为，《启蒙辩证法》在彰显理性自由的同时意识到了启蒙自身的悖论，但却简单地把工具理性等同于启蒙理性，从而悲观地终结了启蒙。启蒙理性自身的重建成了社会批判理论家亟须解决的问题。哈贝马斯在充分发挥启蒙理性“自我参照”的批判范式潜力的同时，把语言学转向的语义学改造成语用学，进而把工具理性改造成交往理性，把主体性改造成主体间性，把意识哲学范式改造成交往范式，把狭义的理性扩展为“总括性的理性”，从而实现了生活领域、生产领域、社会政治领域等各个领域的理性化，拒斥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范式转换和理性基础的重建实现了一场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变革，这种变革不再把世界作为一个僵硬的整体，人也不再是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而是通过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以及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视角的相互转化，使人与世界遭遇了。人与世界的相互融合恢复了启蒙理性自身的批判锋芒，破除了生活世界自身的殖民化，使理性的功能发生了改变，即由理性的统治性功能转化为理性的交往性功能。

在工具理性中，理性的功能是主体运用其对客体进行统治和控制；而在交往范式中，理性的功能是主体运用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意愿，即从主体对客体的统治走向了主体—主体之间的交往，也即主体间性。理性功能的变化导致了另一方面实质性的变化，即理性的运思逻辑发生了转变。在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范式中，人们追求的是一种逻辑上的真理，统一性规范的确定是根据一种形而上学逻辑；而在交往范式中统一性规范的确定不是通过逻辑真理来保证的，而是通过语言的共识来达成的一种非强制性的共识真理。这些思想对于推进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推进当代哲学的发展，是有所助益的。

本书作者杨淑静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这部著作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锤炼形成的。作为指导教师，我希望自己的学生在为人与为学上都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是为序。

孙正聿

2010年10月5日



目 录

序言	(1)
导言 现代性的捍卫与拯救	(1)
第一章 现代性的难题	(21)
一 现代性的旨趣	(23)
(一) 现代性与合理性	(24)
(二) 现代性与主体性	(29)
(三) 现代性与形而上学	(35)
二 现代性的困境	(40)
(一) 合理性与理性的危机	(41)
(二) 主客二元对立的逻辑与主体性的暴力	(57)
(三) 同一性思维方式与绝对的统治	(62)
三 启蒙与现代性	(67)
(一) 理性的放荡与危机	(67)
(二) 主体性的分裂与暴力	(70)
(三) 绝对的丧失与统治	(72)
第二章 启蒙理性的历史透视及其内在困境	(75)
一 启蒙理性的内在逻辑	(76)
(一) 启蒙的非议:启蒙运动	(78)
(二) 启蒙的本意:理性自由	(88)
(三) 启蒙的张力:批判力量	(95)
二 启蒙理性的分化	(101)
(一) 启蒙理性	(102)

(二) 工具理性	(109)
(三) 工具理性批判	(114)
三 启蒙理性的二律背反	(123)
(一) 理性与工具理性	(123)
(二) 理性与技术统治	(126)
(三) 理性与同一性的霸权	(129)
第三章 启蒙理性与交往范式	(132)
一 启蒙理性的合法地位	(133)
(一) 理性基础的转换	(133)
(二) 启蒙的合法地位——关联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论 ..	(142)
(三) 启蒙的解放旨趣——拒斥意识哲学范式	(148)
二 语言学转向与哲学范式转换	(165)
(一) 语言学转向与普遍语用学	(165)
(二) 从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	(174)
(三) 范式的转换与理性基础的重建	(177)
三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与新型社会理性的确立	(181)
(一) 回归生活世界	(181)
(二) 生活世界理性化	(183)
(三) 交往理性	(186)
第四章 启蒙理性与商谈民主	(191)
一 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	(192)
(一) 奥斯维辛与道德合法性危机	(192)
(二) 道德危机的反思与重建	(195)
(三) 商谈伦理与话语共识	(201)
二 道德乌托邦与现实道路的探索	(209)
(一) 普遍的道德直觉	(210)
(二) 道德乌托邦与启蒙理性	(216)
(三) 启蒙的解放旨趣与现实道路的探索	(222)
三 启蒙理性的生成与程序主义民主制度的确立	(226)
(一) 道德与政治的相互纠缠	(226)
(二) 启蒙理性的生成与程序主义民主观	(233)



(三) 商谈民主的现实意蕴	(239)
结语 与马克思同行	(246)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66)

导 言

现代性的捍卫与拯救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在 20 世纪末的西方思想界，能够与哈贝马斯这样一位在社会学、政治学、当代哲学等广博领域都有着深刻影响的文化巨擘齐名的人物，可谓是寥若晨星。哈贝马斯之所以能赢得如此之高的学术地位，主要是因为他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还吸收了洪堡的解释学、皮尔斯和米德的实用主义、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理论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如此广博的学术来源使他的理论不仅涉及认识论、历史哲学、语言哲学，而且还涉及道德与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心理学等。这样一个涉猎领域广泛的哲学家的终生抱负就是安顿伤痕累累的现代性，现代性在凯歌前进的同时自身出现了困境，如何应对这一困境是哈贝马斯的理论任务。1980 年 9 月，哈贝马斯在荣膺“阿多诺奖”时作的答谢致辞的题目是“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他在致辞中坦言只有通过重建启蒙理性才能真正捍卫现代性。哈贝马斯这一报告发表的时候，正值西方知识界以德里达和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宣称与理性主义的决裂、彻底放弃启蒙的关节点上。那么，哈贝马斯为什么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并执意地走下去呢？哈贝马斯又是如何捍卫和拯救现代性的呢？

本书试图在指出现代性难题的同时分析现代性的难题与启蒙理性之间的缠绕关系，进而引出启蒙理性的内在困境，并在启蒙理性自身的困境中分析启蒙理性的缺陷，从而进行彻底的启蒙，这

是哈贝马斯的需要，也是我们时代的需要。

一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问题意识

哈贝马斯之所以一生关注现代性问题，与他的现实生活环境 and 思想历程有关。哈贝马斯于1929年4月生于德国西部的杜塞多夫，这一年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以后的几年中，“德国失业人口猛增，工业生产下降到1929年的53%”^①。童年时的经历注定让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抱着批判的态度，而接下来的经历却促使哈贝马斯转向了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这就是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法西斯纳粹的统治。按照阿佩尔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道德意识，人们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生活方向，“这一代人1945年后生活在一种‘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错了的朦胧迟钝的感觉’中。尽管有良好的愿望，他们无法找到一种对‘重建自己的历史境况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规范’”^②。法西斯纳粹的独裁统治摧毁了德国文化的自然连续性，战后一代人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重建自己的生活意义和目标，哈贝马斯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还颇有感慨地说：“在十五六岁时，我坐在广播前，聆听并体验了在纽伦堡军事法庭（Nuremberg Tribunal）上讨论的事情，当其他人没有由于纳粹的可怕而陷入令人吃惊的沉默之中，而是开始争论审判的正义性、程序问题和管辖权问题之时，令人震惊的第一次分裂（rupture）出现了。当然，这仅仅是因为我不能使自己无视这一事实：集体实现的非人道性（inhumanity）成为大多数比我年长的那代人的相同标准——对此，我仍很敏感且易于被冒犯。”^③ 困惑哈贝马斯的是为什么一个催生了从康德到马克思的伟大的德国却成了孕育纳粹法西斯的沃土，

① 余灵灵：《哈贝马斯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② 卡尔-奥托·阿佩尔：《话语和责任》，转引自得特勒夫·霍尔斯特《哈贝马斯传》，章国锋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7页。

③ 译自伯恩斯坦的《哈贝马斯与现代性》导言，主要参考吉林大学理论法研究中心（www.legaltheory.com.cn）孙国东的翻译。

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进入了阿登那政府。更让哈贝马斯震惊的是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的出版，这本书的出版表明海德格尔拒绝忏悔，仍然认为法西斯政权是拯救世界的一种正确的选择，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中的“本体论转向”是对法西斯主义的间接辩护，他把主宰人类的“在的命运”置于个人理性选择的道德责任之上，并以“这场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昭示着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准备好了二千年之久并赋予德国人民以某种世界命运的存在史境况的反映”，人们除了服从和敬畏存在的命运之外，别无其他的选择。在哈贝马斯看来，海德格尔之所以转向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企图瓦解西方理性主义凌驾于理性之上来确立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这引起了哈贝马斯的理论警觉，他认识到要捍卫现代性就必须认真分析反理性、反启蒙，这样才能找到现代性困境的根源所在。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哈贝马斯认为西方出现了两股反理性的思潮——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股反理性思潮的共同点是：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僵化现代性、反对启蒙理性。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既指老保守主义也指新保守主义。老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德国的施特劳斯、德雷格尔和格伦，美国的丹尼尔·贝尔，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美化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此同时却否定启蒙运动的文化传统，如丹尼尔·贝尔便声称：“工业社会的特有品格有赖于经济与节俭原则：即追求效率、讲究低成本、高利润、最优选择和功能合理性。然而，就是这种品格与西方世界领先的文化潮流发生了冲突，因为现代主义文化强调反认知和反智模式，它们都渴望回到表现最初的本能。一方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正是这种脱节现象构成了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① 60 年代的老保守主义的态度表明支配未来历史进程的不是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132 页。



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理想，而是社会现代化的自主进程。

老保守主义对启蒙精神和现代主义文化的攻击得到了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如君特·罗尔莫泽、阿诺德·格伦和赫尔穆特·舍尔斯基的支持，并且变得越发猖狂，这些人把社会批判、教育改革和左派恐怖主义人为地联系起来，宣布现代性已经“僵死”，已经走入死胡同，只要“怀有敌意的文化”不破坏现有的和谐，这种发展倾向就可以被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新保守主义的策略是，先弱化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联系，然后把启蒙理性和现代性文化冻结起来，宣称现代性已经死亡，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消失，历史已经进入由经济和社会客观变量相互作用决定的自主进化的轨道，即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相对于保守主义对待现代性的强硬态度，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绝不逊色。哈贝马斯把后现代主义称为青年保守派，它全盘否定现代文化和社会的成就，否认理性和现代性理想，这样也就彻底毁灭了现代性自我更新的希望，使人们陷入随遇而安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确是一种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话语主要来自于尼采对理性的自我批判，尼采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彻底丧失了希望，宣称“上帝死了”，从而试图回到神话和始源，他依据酒神精神建立了以意志为核心的权力意志理论，而纯粹的权力意志就是酒神精神的形而上学原则。沿着尼采哲学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后现代主义发展出了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非理性主义路线，从尼采开始，经海德格尔到巴塔耶、福柯，尤以福柯哲学为典型。福柯以“谱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精神病学、医学、惩罚与犯罪学以及各种规训制度的形成过程，宣告“人已经死亡”，从而发展出知识、权力理论等后现代理论。另外一条路线是理性批判路线，从尼采开始，经后期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尤以德里达哲学为典型。德里达通过解构的方法，一方面突破传统，超越源始哲学，另一方面，分析瓦解理性因素，将其与原有的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意义系统，在解构过程中把“存在”置换为“意义”，从而使海德格尔努力强调的“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别被“延异”替代了。在后现代



主义哲学流派中，不论是非理性主义路线，还是理性批判路线，都秉承着一个共同的理念：拒斥理性和启蒙。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对以尼采为转折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近几十年来，在艺术、文学和社会理论讨论中出现了大量的概念，而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无疑是其中最夺目的一个。‘后现代’一词是‘后’概念和思想方法家族中的一员，这其中包括‘后工业社会’、‘后结构主义’、‘后经验主义’、‘后理性主义’等。在这些概念里似乎融入这样一种意识，即我们正在跨越一个时代的门槛，但它的轮廓尚不明确、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这种意识的中心体验就是理性之死亡，它似乎暗示着一个历史性规划的彻底终结，后者包括了现代性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乃至起源于希腊的整个西方文明的规划。”^①以尼采为源头开始的后现代理论，在拒斥现代性、终结理性时有一种基本倾向：力图回到古代社会，希望用古希腊神话来克服现代性的弊病，这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从总体上来说，理性化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倒退回远古时期是没有出路的。宗教的社会整合力量在启蒙过程中趋于衰竭，在现代性中社会发生了分裂，的确需要一个宗教的替代物来整合社会，但是这并不需要返回远古，因为，“启蒙过程难以逆转，犹如启蒙之发生难以遏制一样。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是启蒙所固有的，其根据在于，认识不能因为好恶而遭到遗忘，只能被排斥或由更好的认识加以纠正。所以，启蒙只有依靠彻底的启蒙来弥补自身的不足；这也正是黑格尔及其门徒一定要把希望寄托在启蒙辩证法身上的原因之所在。在启蒙辩证法当中，理性作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发挥作用”^②。现代性的出路仍然蕴涵在启蒙理性的自身之中。

只有理性才能拯救现代性，哈贝马斯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早在1954年写作博士论文时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哈贝马斯的博士论文

①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页。

② 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绝对性与历史——论谢林思想的二重性》借鉴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主要思想，卢卡奇在此书中主要探讨了“物化”问题，这成了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出发点。在卢卡奇看来，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物化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物化成了物与物之间的虚幻的形式，“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①。“物化”不仅发生在商品领域，而且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这是时代面临的最严重的理论问题。这样的时代意识激发了哈贝马斯的思考，同时，这种思考使他兴奋，以至于在二十年后，他读到这点时，仍然“陶醉”地说：“早在大学读书时期，我就读了卢卡奇的著作，尽管这在当时并不‘时髦’”^②，而正是卢卡奇哲学推进哈贝马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使他走向了更成熟的“物化”理论——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哈贝马斯继续说到“在50年代，无论是历史的马克思还是资本主义理论，对我都不重要，真正对我有重要影响的是写作《哲学—经济学手稿》的马克思——一个将抽象问题具体化的理论家。”^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尖锐地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④马克思通过分析劳动的“异化”问题，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0页。

② 张继武：《我和法兰克福学派——J. 哈贝马斯同西德〈美学和交往〉杂志编辑的谈话》，《哲学译丛》1984年第1期。

③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指出人的“物化”实质就是人的“异化”，从而将抽象的“物化”理论具体化。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论积淀，促使哈贝马斯进行了更深入的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如对殖民化、合理化、主体间性等问题的理论探究。

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引导哈贝马斯进行现代性的反思，而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则使哈贝马斯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制高点。哈贝马斯自己说：“卢卡奇指引我走进了青年马克思。阿多诺在我学术生涯中又起到了关键作用”^①，“阅读阿多诺增添了我的勇气，去继承卢卡奇和科尔施在历史上所代表的——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即作为合理性理论的具体化理论。当时我关心的是现代性理论，一种从历史理性的合理性——变形的合理性——角度看的现代病理学理论”^②。这表明，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出发点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而他致力于研究的是现代性的病理学。

现代性之所以由一种历史理性的合理性变成一种变形的合理性，批判理论之所以走入死胡同，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是因为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完全非理性的社会，理性蜕变成了工具理性，自身丧失了批判性，“这一概念（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算计性的知性）同时也提醒人们，一旦目的理性膨胀成为总体性，也就取消了有效性要求与自我持存要求之间的区别，进而摧毁了有效性和权力之间的壁垒，消解了现代世界观以为彻底克服神话就可以实现的基本概念的分化。作为工具理性，理性把自身与权力混同起来，并因此而放弃了批判力量——这是应用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最后总揭露。意识形态批判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描述了批判力量的自我毁灭过程”^③。如此一来，就再也没有任何动力可以让理性的批判力量燃起希望了，工具理性使理性彻底丧失了批

①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判本能。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正是因为霍克海默、阿多诺作出了这样的理论判定，所以他们才毅然抛弃了法兰克福学派一直秉承的社会总体批判的精神，放弃了对现代性和启蒙精神的辩证分析，从人类解放的乐观主义转向了消极的悲观绝望主义。这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很危险的，他否定“启蒙必然走向神话，理性也必定沦为宰制”的悲观论调，并且认为这威胁到了现代性的规范基础，是批判理论的倒退。

现代性自身的蜕变，或者说，由一种历史的合理性蜕变为变形的合理性，这是现代性自身蕴涵的问题，而如何对此问题进行精确的理论分析且不至于走向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悲观理论境地呢？这是任何一个对现代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哲学家面临的问题，也是哈贝马斯面临的理论难题。他常常这样自警：“首先，哲学家能够对现代性话语的反思作出贡献。在现代性话语的指引下，复杂的社会能够对其过去和现在的处境获得更清楚的理解。就一方面，哲学与科学保持密切联系，而另一方面又与常识关系密切而言，从事哲学实践的人，能够发展对社会病理学的批判……最后，哲学家可以要求一种特殊的责任，以分析政治公正问题，特别是关于社会边缘化和文化排斥的‘隐藏的创伤’的问题。”^①沿着这样的哲学理路，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病理学做出了诊断，他认为现代性最大的问题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即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领域，各个领域相互越界，试图以本领域的规范统一其他领域，从而导致了生活领域、生产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等各个领域的殖民化，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系统运用金钱和权力的操控媒介控制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丧失了它本有的媒介——语言，换句话说，即金钱和权力的操控媒介成了系统整合的媒介，使原是生活世界不可替代的整合媒介——语言被纳入报酬与惩罚的单向思考中，使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丧失，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就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代名

^① 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沈清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59页。

